

# 大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之路

李仁虎◎著



直面中国经济新问题

DAZHUANXING

ZHONGGUO JINGJI  
FAZHAN FANGSHI BIANGE ZHILU

探寻中国经济新对策 解析中国经济大转型

用哲学看经济新常态 用系统看经济大转型

ZHONGGUO JINGJI FAZHAN FANGSHI BIANGE ZHILU




中国言实出版社

# 大转型

##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之路

李仁虎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转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之路 / 李仁虎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171-1232-7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  
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5363号

责任编辑：廖小芳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100037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5.5印张
字 数	251千字
定 价	48.00元      ISBN 978-7-5171-1232-7

# 目录

## CONTENTS

### **绪论** / 1

### **第一章 不能承受之重与壮士断腕**

- 第一节 背负“三座大山”快跑 / 13
- 第二节 沼泽地带现象 / 21
- 第三节 觉醒后壮士断腕 / 33

### **第二章 三次产业“鲤鱼跳龙门”**

- 第一节 一产根基要四化 / 45
- 第二节 二产根基要高精尖强 / 55
- 第三节 三产要破垄断变短板为长板 / 66

### **第三章 科技创新决定转型**

- 第一节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根本 / 77
- 第二节 资金是科技创新的保障 / 87
- 第三节 产品是检验科技创新的唯一标准 / 95

### **第四章 体制正反作用于转型**

- 第一节 现行制度的掣肘 / 106
- 第二节 向深化改革要活力 / 115
- 第三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性 / 126

### **第五章 新型城镇化和内需拉动**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最大的新增长点 / 139
- 第二节 以内需为重点的新引擎 / 148
- 第三节 城乡一体化——城市功能延伸的新潜力 / 156

## 第六章 转型的因果链条

- 第一节 政治转型的牵引作用 / 170
- 第二节 政府之手的调节监管作用 / 180
- 第三节 文化转型的稳定作用 / 188
- 第四节 公平正义和改善民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 200

## 第七章 中国大厦根基的未来

- 第一节 以新常态思维谋划实施 / 214
- 第二节 谨防特殊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 / 224
- 第三节 自由、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233

## 参考文献 / 24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3年我国经济保持了7.7%的平稳较快增长，2014年中国经济保持着合理的发展速度，达到7.4%。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46.1%，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比重高出2.2个百分点。三产首超二产，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新阶段，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到了新水平。

中国经济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市场经济，邓小平给这个市场经济戴上了一顶帽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市场经济，但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框架内运行，且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诸多因素中，什么是决定性的因素？毫无疑问是经济。经济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经济这个基础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其他方面转型的条件、时机和方向，但在政治和经济这一对社会的基本关系中，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政治反过来对经济的转型具有牵引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经济转型进程和成效。

中国经济转型正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政治转型正朝着民主和法治化方向迈进，文化和思想转型正朝着自由、平等方向迈进。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道路是方向性的，不会像20世纪的后50年有各种尝试的可能，有跌倒了再爬起来的机会，也不会是单项的改革就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系统性的转型是唯一的选择。这种转型充满着变数，不会像20世纪后20多年那样顺利，但中国人不希望出现灾难性的局面。问题的核心在于，在中国成功转型为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怎样才能避免出现灾难？

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进行成功的转型，而不是转变。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转型是主动求新求变的过

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拉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学者施米特，曾提出了“转型学”（transitology）这一概念。转型不是改革、变革，更不是改良。改革的本意是指在原有体制基本框架下，对原有体制不符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机制进行的一种改良、修正，以获得更大的制度性效率的行为，其基本特点是不对原来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变。而转型是指对原来体制的一种根本性改变，放弃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重构新的体制模式和运行机制的过程。转型是制度的创新和变迁，是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制度变迁，是整体的制度变迁，而不只限于某个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或法律的领域。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中国所经历的制度变迁的目标至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体制变革，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制度变迁内容。前者至少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民主、法治与社会自治。经济体制变革也可细分为三个方面：放开价格，使价格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信号作用；私有化，包括对既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以及新兴私人企业的培育，从而形成能够与政府抗衡的强有力的私人部门，并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符合市场要求，保证其正常运转的一系列制度和法律法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框架由三部分组成：（1）政治结构，它界定了人们建立和加总政治选择的方式；（2）产权结构，它确定了正式的经济激励；（3）社会结构，它包括行为规范和习俗，它确定了非经济中的非正式激励。”<sup>①</sup>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只有当所有这些制度都实现较为根本的变迁，从而确立了与转型之初条件不同的宪法的制度体系，转型才算完成。概括起来说，转型的过程就是立宪的过程。不同的变迁模式，应当是不同的立宪模式。诺斯说：“一个社会的正式制度结构由广义上的宪法体系组成，也就是说，确定政治、经济博弈方式的正式制度结构本身是有意设计出来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体制藩篱，朝着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是一次经济上伟大的长征，是经济体制上的一次方向性的、根本性的重大变革，是思想上一次大激荡、大解放、大觉醒。中国经济在经过了河边地带、山谷地带和丘陵地带的漫长跋涉之后，再经过沼泽地带的艰难探索，

<sup>①</sup> [美] 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46页。

将进入平坦、美好的平原地带。那里的经济将是一个自由的、平等的、法治的经济，是一个基本或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此时，我们正在沼泽地带的后半段，即连接平原地带的过渡带艰难地迈进。这一过程将始终伴随着利益调整、阶层分化、社会矛盾、和平崛起中的国际挑战等一系列比以前更复杂、更难解决的问题。

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型转型的过程中，同时也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社会型转型过程中。在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调整起根本性推动作用的双转型中，体制型转型起到了先导作用，并在社会型转型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型转型随着体制型转型的演进而演进。体制型转型既有开始时，也有结束时，但社会型转型却有开始时，没有结束时，随着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延展，工业社会的形态也在不断地扩展丰富。相对体制转型而言，社会转型是一个更为广泛、深远、持续和漫长的过程，社会转型必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和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旧有的力量必然和新生的力量产生交锋、冲撞、冲突。对于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农业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大国来说，向工业社会转型必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波澜壮阔的巨变。

经济自身面临着艰难转型，前30年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日益暴露出持续高速发展给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留下的恶果，水、空气、土壤等污染日盛，每年摧残着千百万人的健康，吞噬着百余万人生命，践踏着无数人的身体和心灵的栖息地。在经济跑步前进中，社会治理滞后产生了每年百余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也在向世人发出严重的警示。

我们生活在一个奔跑的时代，一个随时可能被病魔侵袭和夺去生命的时代。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对已经付出沉重代价的反思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节约资源发展、环境友好发展、创新发展之路，在转向集约型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等经济发展总体方式的转型，它不是单一转变，而是综合的整体的转变。它把社会公平正义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让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享受蓝天、青山、绿水，让人们记得住乡愁。这一转型的活力来自于全面深化改革，根本动力来自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

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能否取得实效。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保证，要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必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全面深化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指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他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由生产者自由自主地决定生产经营活动，所有的生产者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其地位一律平等，在市场自由平等地竞争，由市场决定交易，由市场决定价格，由市场决定企业的盈亏和生死存亡。

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作用，市场唱主角，就必然意味着政府起辅助作用，唱配角。政府的作用主要定位于调节、监管和引导。政府要明确权力边界和角色定位，要进行自身改革，严格依法行政，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依靠人治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

市场经济必须建设法治政府。没有法治政府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障碍和阻力，必然会在沼泽地带停滞僵持。市场经济需要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没有健全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以自由为基础，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没有人的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

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行不行？答案是否定的。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调整，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要求上层建筑调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经济基础发生改变，上层建筑或慢或快也要发生变革。同一社会形态内经济基础的量变和部分质变，决定了上层建筑要发生相应的量变或部分质变。一种性质的经济基础为另一种性质的经济基础所代替的根本质变，决定着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上层建筑并非被动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是对经济基础存在着反作用，一方面，上层建筑与阻碍和反对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的力量进行斗争，维护和促进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固守制度和思想，成为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力量。经济基础要求上层建筑同自己相适合，以利于自己的发展；上层建筑必须符合经济基础及其发展的需要，否则就不能长期存在下去。

正像西方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分析和预测从来都是站在自己的观点一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经济运行显然并没有完全按西方普遍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来进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或政治转型也将同经济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路径和方式。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不管怎样，转型是必然的，就像中国的经济由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从不完全的市场经济逐步走向基本完全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发展。中国的政治必然要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体系相匹配的政治体系。

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三足。政治形态建立在经济形态基础之上，同样，文化亦如此。任何文化总是产生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文化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小农经济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了封建社会，工业化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必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稳定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和必须抛弃与小农经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等级文化、官本位文化、奴性文化、人情文化，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文化、自由文化、个性文化、法治文化、科学文化。

党的十八大为中国开启了两大新气象，经济上实行全面深化改革，政治上重拳整治党风。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沿着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大胆突破与积极稳妥相结合的路径，紧密有序地推进。整治党风政风从反对四风、出台八项规定开始，接着反腐利剑出鞘，“老虎”“苍蝇”一起打。十八大以来，共有60多位副部级以上干部被立案调查和开除党籍，其中包括几只“大老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和立案审查。其力度之大、出拳之重、打击之狠，为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厉的反腐之举，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清除腐败的决心和勇气。党风、政风、民风清风扑面，民心民意高昂振奋。

综观国际国内，我国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带来变数，新兴经济体又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我国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停滞、僵持、震荡甚至倒退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向前、稳定、持续发展需要付出代价。这是一个充满着生机和希望的时代，一个布满荆棘的时代。

面对复杂的经济局势和预期，必须用新常态思维谋划实施中国经济未来。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增速迎来换挡期，从前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和中速平稳增长期过渡进入常态。新常态有三个核心内容，即增长速度的新常态、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宏观政策的新常态。经济上的新常态思维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高速增长的预期和制度安排为中高速和中速增长的预期和制度安排，要改变

过去那种行业、产业、产品的结构性普涨为突出重点、突出质量、突出效益的增长，要改变过去那种行政性、急刹车式、大放大收、过于频繁的宏观调控为杠杆式的、定位精准式、设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调控。

从旧常态到新常态，党中央、国务院转变经济发展方略。201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微观要活、宏观要稳、社会政策要托底方针，此后再三重申，传达避免过度刺激，避免竭泽而渔，避免频繁变动等内涵。本届政府的做法是主要依靠改革释放市场活力，强调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投资的作用。2014年，国务院共出台了20多个文件政策，涉及简政放权、工商登记制度、户籍制度、医疗卫生体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等20多个重要的领域或方面，通过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调整结构。

新常态并非坐等守成之态，并非按部就班之态。经济运行中的矛盾、问题和风险并没有因新常态的出现而消失，相反，在一些领域和环节甚至更加突出复杂，因而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从短期看，应谨慎观察新常态下的各种矛盾，既要保持政策定力、避免手忙脚乱，也要主动作为、相机抉择，实行更加务实的政策，防止经济运行偏离合理区间。从中长期看，应以科学的历史观、时空观和内外观，从战略性、系统性、整体性高度推进改革。在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变化时要保持平常心、保持定力，绝不走宏观经济追求短时效果而急功近利、微观经济难测政策变动而无所适从的老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仔细观察分析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对外关系，人们可以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常态不但在经济领域里来临，而且几乎全方位地迫近中国的方方面面。2014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5周年；再过35周年，恰好是2049年，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无论是国内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抑或是对外关系中的许多矛盾，都在过去35年里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些问题都到了需要转型的临界点。在社会领域，贫富差距过大、阶层相对固化、群体事件高居不下、社保不健全等问题，都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在政治领域，民主建设，反腐常态化之后如何步入法治化，法治中国建设，意识形态多元化并管理较严，人权状态改善等问题，更为艰难复杂。在外交领域，中国和平崛起受到了一系列挑战，中美、中俄、中

欧、中日以及中国和周边、双边、多边关系都需要确立新战略、新思维、新定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大体上有了共识，现在需要在其他领域里对新常态的认知并形成共识。如果说把1979年至2014年的35年视为中国的旧常态，那么，2014年至2049年的35年可看成中国的新常态。未来35年，将是中国在新常态中，以一种新思维、新战略、新路径引导中国进入发展的新阶段。



## 第一章

# 不能承受之重与壮士断腕

1978年，中国GDP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1.8%，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人均GDP从1978年的182元，增长到2012年的5410元。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通常有两项指标，一是GDP，二是人均GDP。

贫穷的中国一旦觉醒，经济发展的速度便令世界震惊，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奔跑速度一路领先的背后，是对能源的巨大消耗。中国扛着庞大的能源包袱，创造的价值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们一边享受着日益富足的生活，一边承受着日益严重的污染。

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河边地带、山谷地带、丘陵地带，眼下正在沼泽地带的后半段跋涉。经济体制改革突破艰难复杂，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干预经济与不干预经济陷入两难，垄断行业改革艰难复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尚未取得突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仅仅破题。

经济发展方式到了非转不可的时候。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李克强总理数次提出，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